

# 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 ——2020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趙哲

**[摘要]** 2020 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在步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新冠疫情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時刻。在此緊要關頭，澳門文學的發展並沒有止步不前，而是以平穩漸進的步伐繼續向前邁進。澳門文學在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進程中逐步完善着自我形象的建構，使之呈現出更真實、更清晰的自我定位；隨着研究視野的進一步開拓，與之相關的文學研究也成就了其廣度和深度的多向度拓展；在文學創作方面也有不凡的收穫，湧現了一批與疫情相關的主題指涉作品，顯現出澳門文學對人類共同議題的及時關切。

**[關鍵詞]** 澳門 文學 2020 年 研究概況 發展動態

## 一、新征程、新姿態：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首次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上提出。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有助於豐富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生態，提升區域內文化的認同感。澳門與它的鄰居香港一樣，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既重要又特殊，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都是嶺南地方文化的承襲者，均擁有中國東南沿海特質的文化血脈，而這種濃厚的地域文化基因早已埋藏於城市的肌理之中。後因歷史的偶然命中，澳門“被選擇”改寫了城市命運，異質文化的注入扭轉了原本單一而內向的文化傳承模式，形成了開放而混雜的次生文化。雖然歷史的選擇一度讓澳門失去了國籍，但百年間與祖國的往來卻從未間斷，澳門不僅作為中外信息的交匯點，還與香港同時在文化群體“南下”與“北上”的往來中扮演了“第三空間”的角色。雖然這開放而混雜的次生文化為文化基因的識別帶來一定難度，但是數千年來的中華文化基因從未斷裂，由此它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奠定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基礎。<sup>①</sup>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近一步發展，澳門文學在這個城市群的緊密互動中重新被定位、被重視。澳門文學也正以新姿態積極融入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中，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2020 年 8 月 29 日，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當代香港文學跨界現象研究”（編號 20FZWB06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媒介融合與當代江蘇文學跨界互動研究”（編號 2020OJSA1089）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徐州 221018

<sup>①</sup> 趙哲：《識別與傳承：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建構中的中華文化基因》，《文藝報》（北京）2020 年 12 月 18 日。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編委與專家座談會在廣州召開，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室主任李建軍；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朱壽桐等人出席會議並講話，會議由編委會主任張培忠和蔣述卓共同主持。《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已於同年創刊，迄今刊出3期。該刊物作為廣東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雙月刊，由賀仲明教授擔任主編，正如創刊號《編後記》所述，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評論刊物，主要以“呈現這一地區開放和創新的傳統文化特徵”為主要追求目標，<sup>①</sup>並以“努力建設新時代文學理論創新和觀念變革的前沿陣地”為方向，<sup>②</sup>從中體現出該刊物的國家戰略立足點與地方視野的全球性拓展。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專門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題詞：“希望這份雜誌在建設大灣區的宏偉實踐中，在多元文化的匯流激盪中，以充沛的活力和創造力，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理論創新、觀念變革的前沿。”<sup>③</sup>刊物的創立，不僅為大灣區文學研究提供了更加精準的理論平台，而且能夠有助於進一步“挖掘、思考和深化本土文學中的地方文化個性，從文化和美學的高度認識其價值，並將地方文化與民族國家意識充分結合和豐富起來，促進具有獨特文化個性的高品質文學作品的產生，同時也推動地方文化與民族整體文化的交融和互動。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也應該積極關注本土文化在文學中的呈現和發展，促使地域文化個性在文學表達中的不斷深化，包括對粵港澳大灣區地方性文學經典歷史的探尋和闡揚，對具有實力的年輕本土作家及時關注和推崇”。<sup>④</sup>

澳門文學是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重要構成，以自身的特性豐富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生態，基於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澳門文學與兄弟城市之間彼此交融又各成風姿，因此大灣區文學絕不是對粵港澳新文學史發展過程中的省港、省澳的“結構化”現象的簡單重複。<sup>⑤</sup>蔣述卓、龍揚志提到：“港澳作為彰顯地方特色的文學空間對於中國文學的意義，實際上遠遠超過了一般區域文學的作用。”<sup>⑥</sup>澳門文學在積極融入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過程中，得到了被重新審視的機會，改變了長期以來在文學史敘述中被簡化、被遮蔽的現象。朱壽桐認為，在談及中國文學的近現代演進時，澳門的作用不容忽視：“中國的近代化和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史，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從澳門說起。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記憶，澳門文學無論多簡陋、粗糙，都將這樣的歷史以生動的形態記錄下來，以豐滿的精神狀態得以保鮮。包括早期詩僧結社及其相應的創作，包括清代一些隱居澳門的官員感時憂世之作，澳門文學最早傳達出近代化的強烈信息，為中國文學的現代進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與

<sup>①</sup> 賀仲明：《編後記》，《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2020年第1期。

<sup>②</sup> 《努力建設新時代文學理論創新和觀念變革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編委與專家座談會綜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2020年第2期。

<sup>③</sup> 《努力建設新時代文學理論創新和觀念變革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編委與專家座談會綜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2020年第2期。

<sup>④</sup> 賀仲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品質與意義》，《南方日報》（廣州）2020年5月17日。

<sup>⑤</sup> 蔣述卓、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共時呈現》，《當代文壇》（成都）2020年第1期。

<sup>⑥</sup> 蔣述卓、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共時呈現》，《當代文壇》（成都）2020年第1期。

資源。”<sup>①</sup>例如，1815—1830 年間，馬禮遜傳教士先後在澳門、香港、廣州等地嘗試用活字取代木刻來印刷中文書籍，在澳門成立了“馬家英式印刷所”，後又將石印機搬移到廣州十三行，中國出版行業的現代歷程因此而展開。<sup>②</sup>正如細數歷朝代到訪澳門的名人，還不難發現湯顯祖、屈大均、魏源、陸希言、何紹基、康有為、張道源、丘逢甲、黃石集、奢介春、阮元、汪兆墉、吳道熔等人都留下過曾經深入澳門社會的印記，據李德超統計，明清時期到訪過澳門的中國文人多達 130 餘人，創作了 400 多篇詩文。<sup>③</sup>這為澳門地區古體詩的發展及其成就找到了關鍵性的源頭。蔣述卓、龍揚志認為，澳門及毗鄰的廣州與香港在近代印刷術和出版業的發生過程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此外，澳門以戰時的中立地位吸引了“李供林、陳洵、朱希祖、黃節、詹安泰、章士釗、葉恭綽、廖平子、陳蝶衣、陳融、鄭春靈、高劍父等大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前來躲避戰火，他們發起成立‘四界救災會’、文化協會、前鋒劇社、曉鐘劇社、起來劇社、綠光劇社、吶喊文學研究社、怒吼社、淘聲社、曉社讀書會、前哨讀書會、暴風劇社、中藝劇團等文藝社團，愛國華人社團則紛紛捐資創辦勞工子弟學校、銀業公會小學、菜農子弟學校、水電工人子弟學校、糧食公會小學、鮮魚子弟學校、航業公會小學、豬臘工會子弟學校等子弟學校，在華人社會普及發展初級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sup>④</sup>因如上諸種條件的會聚，由此萌生了三地南方“新文化中心”一說，顯示了穗港澳三地，尤其澳門彼時在文化上的特殊吸引力。不僅如此，隨着學界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概念的認識不斷深入，澳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關鍵性不斷被挖掘，澳門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也就需要重新定位，至少澳門文學應有面目隨着大灣區文學研究的深入而逐漸浮出，逐漸明晰。

## 二、新視野、新維度：同時發力的多向度澳門文學研究

趙海霞在《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一文中，以時間維度為參照，將澳門近代文學分成了 19 世紀早期、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以及抗戰時期三個發展階段，文章以近代報刊媒介對文學的介入為觀察視角，勾勒出澳門地區近代刊物與本地文學的互動脈絡。該文認為，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創辦的《鏡海叢報》創刊號（1893 年 7 月 18 日）中刊載在第 6 頁末尾的《閱史有感》和《書懷》兩首詩歌，是為澳門中文報刊文學的起始點。<sup>⑤</sup>文章詳細介紹了 20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期的幾份重要報刊對本地文學的推動。例如《知新報》（1897）是康有為、何廷光、梁啟超等人在澳門創辦的一份政論報紙，具有濃厚的現代意識色彩。文章指出，該報自第 112 冊開始，增加了以詩詞為主要體裁的文藝性專欄內容。“《知新報》上的詩詞有兩類，一是由第 46 冊起的‘閩中新樂府’，另一類是在最後一年出現在

<sup>①</sup>朱壽桐：《從澳門學到澳門文學》，《光明日報》（北京）2015 年 12 月 21 日。

<sup>②</sup>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第 6—13 頁。

<sup>③</sup>李德超：《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韓國全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73 年。

<sup>④</sup>蔣述卓、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共時呈現》，《當代文壇》（成都）2020 年第 1 期。

<sup>⑤</sup>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 年第 1 期。

‘報屁股’的詩詞。這類文藝性文字每冊約佔一頁（兩版），通常放在報紙內文最後部分，在技術頁之前”。<sup>①</sup>這兩類詩詞的內容涉及纏足、抽鴉片、溺死女嬰等黑暗社會現實，呈現出“詩歌新聞性”的特點，詩文將先進的現代觀念、“民主”和“自由”等現代詞彙和外國人名引入其中，顯現出濃厚的近現代氣息。<sup>②</sup>除了《鏡海叢報》和《知新報》，文中還列舉了《澳報》（1899）、《濠鏡報》（1901）等諸種澳門本地刊載文學作品的近代報刊。

據介紹，進入20世紀澳門文壇的主要活動仍以組織詩社以及詩詞唱和為主，而馮秋雪等人在澳門組織的“雪社”（“雪堂詩社”）則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藝團體的作家群落”。<sup>③</sup>雪堂詩社定期聚會並以“月課”的形式創作詩詞，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文學活動便是編輯出版《詩聲》（即《雪堂月刊》）。《詩聲》創刊於1915年7月，直至1920年6月一共出版了四卷46期。文中介紹，《詩聲》的第1卷多發表古代詩論，自第2卷起將原本編輯體例分設“叢錄”、“纂著”兩個門類，並且增設了“詞苑”欄目用於刊登詩詞作品，又設“投稿”用來徵召社外人士作品的發表。第3卷起又增設“詩格”，介紹歷代名詩。第4卷增加了附刊《詩聲附庸》，其中馮秋雪寫於民國九年（1920）一月的一首新詩《嗚呼紙鳶》就刊載於此，詩歌寫到：“西風起，紙鳶飛滿天，放哩！放哩！的聲，鬧成一片。／斜日照着林梢，好一個天氣已涼，時節又暖。／放紙鳶！放紙鳶！放紙鳶！”<sup>④</sup>據澳門大學鄧駿捷教授2020年的考證，該詩是目前所知澳門的第一首新詩，這個發現進一步拓展了對澳門新文學發展進程的認知。<sup>⑤</sup>此外趙海霞還在這篇論文中強調，《詩聲》自第1卷第1號起，就刊載詩話、詞話等古代文學理論作品，討論包括詩歌的境界、主旨、格律、詩人風格等方面的內容，如《山藏樓詩話》、《霏學樓詩話》、《心陶閣詩話》、《飲劍樓詩話》、《遠廬詩話》以及張炎的《詞源》和周濟（止庵）的《詞選序論》，而馮秋雪所撰的《冰篋詞話》四回，則是該時期澳門相當重要的詞話論著。<sup>⑥</sup>馮秋雪在1925年重組“雪社”，又將其中的同題作品、社員詩詞編輯出版為《雪社詩集》。《詩聲》和《雪社詩集》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遂成為這一時期澳門詩詞創作與理論發展的代表。

進入20世紀30年代，伴隨着《小齒輪》（1933）、《大眾報》（1933）、《華僑日報》（1937）、《市民日報》（1944）、《藝峰》（1940）、《迅雷》（1945）等報刊的相繼出現，澳門新文學也在寂靜之中悄然起步。作者對只刊發了一期但是具有時代意義的文藝刊物《小齒輪》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由香港作家魯衡主編，是一本純自費的刊物，誕生於澳門。內容上覆蓋了小說（《快要咆哮的手車輪》、《掘井》、《時代速寫》、《媒》）、

<sup>①</sup>鄧耀榮：《澳門維新派政論報〈知新報〉》，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6年。

<sup>②</sup>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年第1期。

<sup>③</sup>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第42頁。

<sup>④</sup>馮秋雪：《嗚呼紙鳶》，《詩聲》（澳門）1919年第4卷第8號。

<sup>⑤</sup>鄧駿捷：《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年第5期。

<sup>⑥</sup>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年第1期。

隨筆（《異域隨筆》）、雜文（《加緊揮動我們的文化武器吧》）、詩歌（《憂鬱的琴》）以及劇本（《勝利的死》）等，所涉及的文學體裁較為齊全，而其中的作者也多來自港澳地區，從其中的篇目名稱也不難看出受到了中國內地左翼文學的影響。而刊發於澳門，但寫作的主力集中於香港的這種特殊現象，似乎是劉登翰研究員指出的“寄養”現象以及朱壽桐教授曾談及的“僑寓”現象（即由於澳門本地缺乏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澳門本地作者去別處尤其是去香港尋求發表的一種現象）的一個反證，但也同樣反映了香港文學在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同時代的《大眾報》、《華僑報》、《市民日報》紛紛創刊，也加速了這一時期的澳門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而 20 世紀 40 年代的純文學期刊《藝峰》、文藝性週刊《迅雷》也能從側面印證澳門文學的發展雖然緩慢但始終延續未曾中斷，直至 1958 年《澳門日報》的文學副刊“新園地”，成為澳門文學和本土作家的重要陣地，澳門文學逐漸蓬勃起來。<sup>①</sup>這篇文章從三個不同時段清晰勾勒出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互動關係的發展脈絡，為讀者展現了澳門文學早期發生的媒介生態。

霍超群博士於近兩年關注了澳門賭場書寫與文化空間的關係，<sup>②</sup>以及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兩個方面。<sup>③</sup>前者是與凌逾教授合作的文章《從“殉賭”到“殉城”：澳門賭場空間與城市文化》，文中分析了澳門漢語新文學中與“賭”相關的一系列文本，發現了其中塑造了“殉賭者”和“殉城者”兩類書寫主題，並分析了從“殉賭者”到“殉城者”的演變邏輯，通過賭場書寫和塑造賭城形象背後的個體經驗，體現出文學場域中對澳門城市倫理和城市文化反思的表達。透過文本的印證，兩位學者也指出了澳門所謂的“文化城市”理念，實際缺乏核心價值與穩固的文化根系，值得反思。文中分析了 20 世紀 60 年代的兩部小說——鏗未殘《老顧客》、游靜萍《格力狗》中賭徒悲劇的命運同質性，此中的賭徒都毫無懸念地指向了滅亡，完成了“賭博——破家”敘事框架；而太皮的小說《荷官歐陽家明》、梁錦生的小說《虧空澳門》、方恨少的小說《浮影》、李宇樑的中篇小說《上帝之眼》、短篇小說《二〇二七》、《失物二十四小時》則是將視點從賭徒移向了依附於賭場產業鏈中生存的小人物，與此前賭徒形象的塑造不同的是，這類“人物的悲劇不止於個人意義上的道德失控，而是與城市命運息息相關”，<sup>④</sup>遂成為“為城市發展而死”，“賭城擴張下無名的犧牲品”的“殉城者”。此外，對於澳門有關“賭城”指涉，文章也作出了簡要梳理，例如亨利·諾曼（Sir Henry Norman, 1st Baronet）的旅行日記中書寫澳門的章節——《澳門：葡萄牙的神秘中心》（1895），台灣作家牛哥的小說《賭國·仇城》（1948）以及內地吳威如的小說《夢斷澳門》（1997）等，其中對於澳門的城市形象書寫

<sup>①</sup>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 年第 1 期。

<sup>②</sup>凌逾、霍超群：《從“殉賭”到“殉城”：澳門賭場空間與城市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南京）2019 年第 2 期。

<sup>③</sup>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

<sup>④</sup>凌逾、霍超群：《從“殉賭”到“殉城”：澳門賭場空間與城市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南京）2019 年第 2 期。

都不約而同指向了“賭城”這個關鍵字。進入 21 世紀初期，澳門本地的本土意識及身份建構的需求日益突顯，作者通過方欣的《葡京，下不完的賭注》、李宇樑的《上帝之眼》、吳威如的《夢斷澳門》、陸奧雷在小說《東望洋時速 200》等幾篇小說文本，探討了澳門城市精神實質的落點，以及賭場所介入此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引發一系列的反思。

霍超群博士在《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一文中以澳門華人為立足點，分析了回歸後澳門漢語文學中土生葡人形象的轉變，基於對漢語文學作品的分析，作者試圖以發展的眼光，梳理出了土生葡人從“入侵者”到“澳門族群”的形象變化，並認為土生葡人除了被賦予“新人”的身份之外，這一群體在澳門的“家”小說中還承載着“消弭痛苦”與“創造新生”的功能，這背後折射了“遲到了”的澳門式溫情，作者還認為，這種現象“與澳門如何看待自身被殖民的歷史相關。族群關係的重構，既是對‘澳門’這一異質空間的某種追認，又是對澳門當下多元文化樣態的認同”。<sup>①</sup>作者歷數澳門漢語文學作品，發現在以寂然的前期作品《烏夜啼》為代表的時期，民族主義色彩還相對濃厚，“無論是純種葡萄牙人還是土生葡人，以橫行霸道、仗勢欺人的入侵者身份居多。余行心的《絲士咖啡室》、陳志峰的《一九六六、一九九九》、馮傾城的《德國人眼中的澳門》等篇章可歸入此類”。<sup>②</sup>但回歸之後，隨着先前層級分明的格局逐漸被打破，澳門華人與“土生”之間的交流也就變得更加廣泛而深入，前期以揭露中葡緊張關係的敘事模式很難繼續以主流的方式進入漢語作品中。這一時期產生了諸如呂志鵬《外面》中的土生員警小戴、太皮《懦弱》中的女偵查員白羅莎、何貞《澳門來兮》中的威廉、太皮《綠氈上的囚徒》中的菲拿度等一類“土生”新形象，他們不同於前一時期的全方位負面形象，而是攜帶着自己種族的記憶以一種新身份融入澳門華人社群當中去。文章選擇了陳志峰的《法朵》與何貞《澳門來兮》這兩則頗具代表性的文本，聚焦土生族群在面向“母體”、“在地”與“他者”時的糾結與複雜，“華人作家似乎抓住了這一點，生發出多個表達‘認同’與‘疏離’的辯證關係的故事，使得這群‘只屬於澳門的人’在澳門的‘家’小說中承擔着消弭痛苦、創造新生的功能，當中透露出的悲憫，確實達到了治癒人心的作用。這或許是一種獨屬於澳門的溫情”。<sup>③</sup>作者還通過稜稜與何貞的小說作品比較了不同時代的澳門華人對土生族群的迥異態度，“在那個被異邦統治的年代，作家對異族‘他者’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中葡雙方至多是一種互不干犯的‘並存’關係；但在後回歸時代，以何貞為代表的作家更傾向於將雙方的關係描述為一種和諧包容的‘共生’的存在——‘複數澳門性’以這樣的方式彰顯”。<sup>④</sup>此外，作者還列舉了土生文學作品——阿德（Adé）的詩歌《老

<sup>①</sup>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年第3期。

<sup>②</sup>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年第3期。

<sup>③</sup>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年第3期。

<sup>④</sup>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年第3期。

屋》、李安樂的詩歌《兩座小屋》，並試圖從土生文學這面鏡子來反映澳門的空間複雜性，也可從中管窺澳門已然作為不同族群共生的“家”這一現實，從而解釋了土生葡人形象從“入侵者”到“縫合者”轉變的根本原因。

余思亮博士使用跨界視角也於近兩年間分別討論了廣府南音與葡語對白在小說文本與舞台演出之間的越界形態，<sup>①</sup>以及澳門美食散文中體現在味蕾與文字之間的跨界意蘊——透過書寫美食所表達出來的認同心理與故土情結。<sup>②</sup>前者討論了2017年的一部澳門現代話劇——《長衫詞》，<sup>③</sup>如何以土生葡人女性作家江道蓮的小說《長衫》為主要故事線索，並將粵語表述融入傳統廣府南音說唱、葡萄牙怨曲法朵（Fado）和葡語對白等多種表達形式，呈現出多語言交匯、跨藝術形態的融合特徵，也直接反映出澳門本地這種獨特的文化生態。該劇以20世紀40年代的澳門為故事背景，運用戲劇演員和說唱演員同時在場的互動表演方式，以長衫（旗袍）為象徵符號，探討女性命運的同時，直接指向了新舊觀念更迭、跨文化身份認同等社會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劇中所出現的《長衫詞》曲詞：“花露凝點恨水長東，想起繆蓮往事，理屈詞窮。”這是《客途秋恨》中書生繆蓮與妓女麥秋娟遙相思念的情感，暗諷張玉“所托非人的愛情悲劇，最後被自己深愛的男人親手殺害，不得始終，有屈難訴”的悲慘命運，<sup>④</sup>其實這也是對南音經典曲作《客途秋恨》的跨文本重釋。通過多語種表達、藝術形式重疊、文本跨越等多重方式，這部劇作體現了澳門的多元文化特徵以及藝術表現的實力；後者以澳門201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成為繼成都、順德之後第三個獲得評定的中國城市這一現象為切入點，詳細介紹了散文集《文字裏的古早味——澳門作家的味蕾》中李烈聲《蝦醬之戀》、吳淑鈿《古早味之樂》、林韻妮《母親的蝦片》和水月《美味的工人球場》等篇目，在澳門的美食散文之中重現童年記憶，連結親情血脈，通過味覺感官與文字的跨界整合，提示我們，“一道佳餚能重拾中國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無論身在何方，家鄉的味道時刻提醒漂泊的遊子，毋忘故土”。<sup>⑤</sup>

楊慧瑩《澳門20世紀80年代新移民詩人的成就及成因》一文從內外兩個層次分析了澳門20世紀80年代的新移民詩人所獲得的文學成就。作者認為，澳門本身所具有的包容與開放、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文化環境為新移民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書寫空間，而新移民詩人在作品呈現的漂泊之感、力度感較高的詩歌精神與多樣性的創作風格，“與澳門本土所具有的平和、舒緩的詩歌風格相補足”，<sup>⑥</sup>同時也豐富了澳門本土詩歌創作的生態。

<sup>①</sup>余思亮：《粵音與葡韻迭影的美學交融：再現澳門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蓮小說〈長衫〉》，《美與時代》（鄭州）2019年第9期。

<sup>②</sup>余思亮：《激發文字裏的味蕾：澳門美食散文的身份認同與鄉土情結》，《新閱讀》（北京）2020年第11期。

<sup>③</sup>由澳門本地表演團體——足跡 Step Out 與區均祥粵劇曲藝社合作。

<sup>④</sup>余思亮：《粵音與葡韻迭影的美學交融：再現澳門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蓮小說〈長衫〉》，《美與時代》（鄭州）2019年第9期。

<sup>⑤</sup>余思亮：《激發文字裏的味蕾：澳門美食散文的身份認同與鄉土情結》，《新閱讀》（北京）2020年第11期。

<sup>⑥</sup>楊慧瑩：《澳門20世紀80年代新移民詩人的成就及成因》，《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長沙）2020年第2期。

宋梓默的碩士學位論文《〈人民日報〉對澳門形象的建構研究（1999—2018）》從媒介形象的視角討論國家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中澳門形象的問題。論文認為，從近 20 年的文本分析中基本可以看出，《人民日報》對澳門的報道多以 500 字以內的短篇消息為主，主要集中在要聞版面，並且政治類的議題佔主導地位，受“一國兩制”政策的一貫性的延續所致，因此除了報道的形式之外，20 年內的報道特點變化並不特別顯著。基於官方話語為主導的“正面、中立”的報道傾向，《人民日報》建構了“積極、正面的澳門媒介形象”，並且這種媒介形象受制於“政策典範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澳門與國家發展的關聯定位”、“媒介屬性與價值偏向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論文認為，要想祛除由於這“一種理想化的和諧美好的建構效果”對於澳門社會所面臨的真實問題的遮蔽，應“加強對澳門社會各領域深入、全方位的關照，展現真實而不浮於表面的澳門風土人情；傾聽來自澳門社會真實的表達，平衡多方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形成建構客觀真實澳門的社會合力，讓受眾在和諧穩定的澳門形象中能夠感知到‘理性’指引下的真實的澳門”。<sup>①</sup>

從研究本身來看，整體上本年度既有對澳門 19 世紀末期為起始點進行的近代報刊與文學關係的梳理，也有從 20 世紀 60 年代為始端進行的澳門賭場的文本分析，還有對 20 世紀 80 年代澳門新移民詩人的探討，以及從澳門回歸為時間節點進行的土生葡人形象研究與官方報紙中的澳門形象研究，因此，本年度的澳門文學及其相關研究從時間維度實現了“百年跨越”，呈現出宏闊的研究視野；內容維度上，覆蓋了從報刊媒介到文學發展、從傳統文本到現代舞台、從文字到味覺感官的多重跨界形變，還針對澳門文學與賭場空間的文化關係、土生葡人形象等澳門特殊的文學生態，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探討。由此可以看到，澳門文學研究正在向研究視野的拓展、研究廣度和深度的延展同時發力。

### 三、新收穫、新議題：本年度澳門文學創作的新情況

最終結果，有力展示了本年度澳門文學創作的豐收情況。此次文學獎分別開設了本地組與公開組，充顯示出澳門文學的包容態度。據主辦方的統計，共收到本地組作品 158 份，包括散文 45 份、新詩 40 份、劇本 13 份、短篇小說 36 份及中篇小說創作計劃書 24 份；共收到公開組作品 69 份，包括散文 46 份及短篇小說 23 份。當中，本地組中篇小說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共選出入選創作計劃共 8 份，並於第二階段收到最終完成作品 7 份，<sup>②</sup>從作品數量來看，不難發現大眾對於文學創作的熱衷程度。本屆的比賽評委由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的知名作家、詩人及評論人組成，也充分說明澳門文學空間的開放性特質。最終經各組評委的綜合評審，評選出了本機群組中篇小說優秀獎三名及鼓勵獎兩名；劇本冠、亞、季軍各一名；本地組及公開組散文、新詩及短篇小說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

<sup>①</sup> 宋梓默：《〈人民日報〉對澳門形象的建構研究（1999—2018）》，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

<sup>②</sup> 《第十三屆澳門文學獎比賽結果公佈》，<https://www.fmac.org.mo/article/news/view/5620>。



獎各五名。分別是，本地組散文冠軍：金學良《異鄉人》、亞軍：周江明《帳簿》、季軍：郭妙瑜《好如一瓶白開水》；本地組新詩冠軍：袁紹珊《板塊移動》、亞軍：黃春年《黑洞、血和泥土——送給歲月的敘事歌》、季軍：莊志豪《里斯本港》；本地組劇本冠軍：葉玉君《石城》、亞軍：鍾智威《離家很遠》、季軍：黃若洲《美的路情》；本地組短篇小說冠軍：譚健鍬《入關•出關》、亞軍：鄧曉炯《傳說》、季軍：梁茵雅《漆紅色的日記本》；本地組中篇小說優秀獎：鄧曉炯《迷城咒》、張健嫻《陰性》、李宇樑《半張臉》（原名：M城98、99。98是96的情夫）、鼓勵獎：彭曉麗《聽風低語》、胡六根《瘋堂人》；公開組散文冠軍：譚健鍬《致我的草堆街》（原載於2020年5月13日《澳門日報》）、亞軍：劉利祥《夢魂不憚濠江遠》（原載於2019年12月20日《光明日報》），季軍：袁紹珊《給我一片黃色的澳門時間》（原載於第32期《無形》）；公開組短篇小說冠軍：黃厚斌《手套之家》（原載於第346期《特區文學》）、亞軍：譚健鍬《風暴之前》（原載於第429期《香港文學》）、季軍：林倩婷《現在或未來》（原載於第75期《澳門筆匯》）。正如主辦方的設想那樣，通過近年來持續不斷地舉行澳門文學獎，鼓勵了越來越多的作者進一步投入澳門文學的創作之中，也從中成功發掘一批又一批的文壇新銳，形成澳門作家之間的良性互動與切磋，並且由近年“澳門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中被發掘進行跨界創作的作品逐漸湧現。例如第三屆戲劇組的冠軍之作《捕風中年》（李宇樑）被改編成電影《還有一星期》，小說組優秀獎作品《奧戈的幻覺世界》（廖子馨）被改編成電影《奧戈》，第六屆戲劇組季軍作品《魔法寶石——一個關於夢想、勇氣和愛的傳奇》（鄧曉炯）改編成結合魔術的原創兒童劇《魔法寶石》，第十屆戲劇組冠軍作品《決定•性》（葉玉君）由澳門藝術節特地委約澳門戲劇精英製作創意舞台劇，這兩部跨界作品都曾在澳門藝術節上演。此外還有第六屆戲劇組亞軍作品《江記士多》、第七屆戲劇組冠軍作品《Baby Baby》及優秀獎《生之葬禮》、第八屆戲劇組季軍之作《尋找愛的出口》，都有過被跨界改編的經歷，這說明了澳門作家的隊伍正在不斷壯大，作品的水平和跨界形變張力都在不斷提升。<sup>①</sup>

而在2020年全球疫情得肆虐下，澳門文學創作也及時湧現出了疫情相關的敘事主題之作，呈現出新時期下澳門文學的嶄新議題。如陸奧雷的短篇小說《禁閉島》、穆欣欣的散文《文化抗疫，用以抵抗生命中的黑暗》、公榮的散文《春江水開始暖了》、穆森的《新年新希望》、楊宓的散文《雙城記》等，體現了文學對人類共同議題的及時關切。

在2020年的特殊情形之下，全球各行各業受到極大波動，澳門文學卻能夠做到緊跟時代步伐，以積極的姿態，踏上了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新征程，文學研究更是以百年跨越的開拓性視野實現了多維度的拓展，文學創作也是收穫頗豐，呈現出嶄新的發展動向。

[責任編輯 陳超敏]

<sup>①</sup>《共同書寫澳門的文學風景——第十三屆“澳門文學獎”徵集》，《文藝報》2020年7月27日。